

道典诠释书系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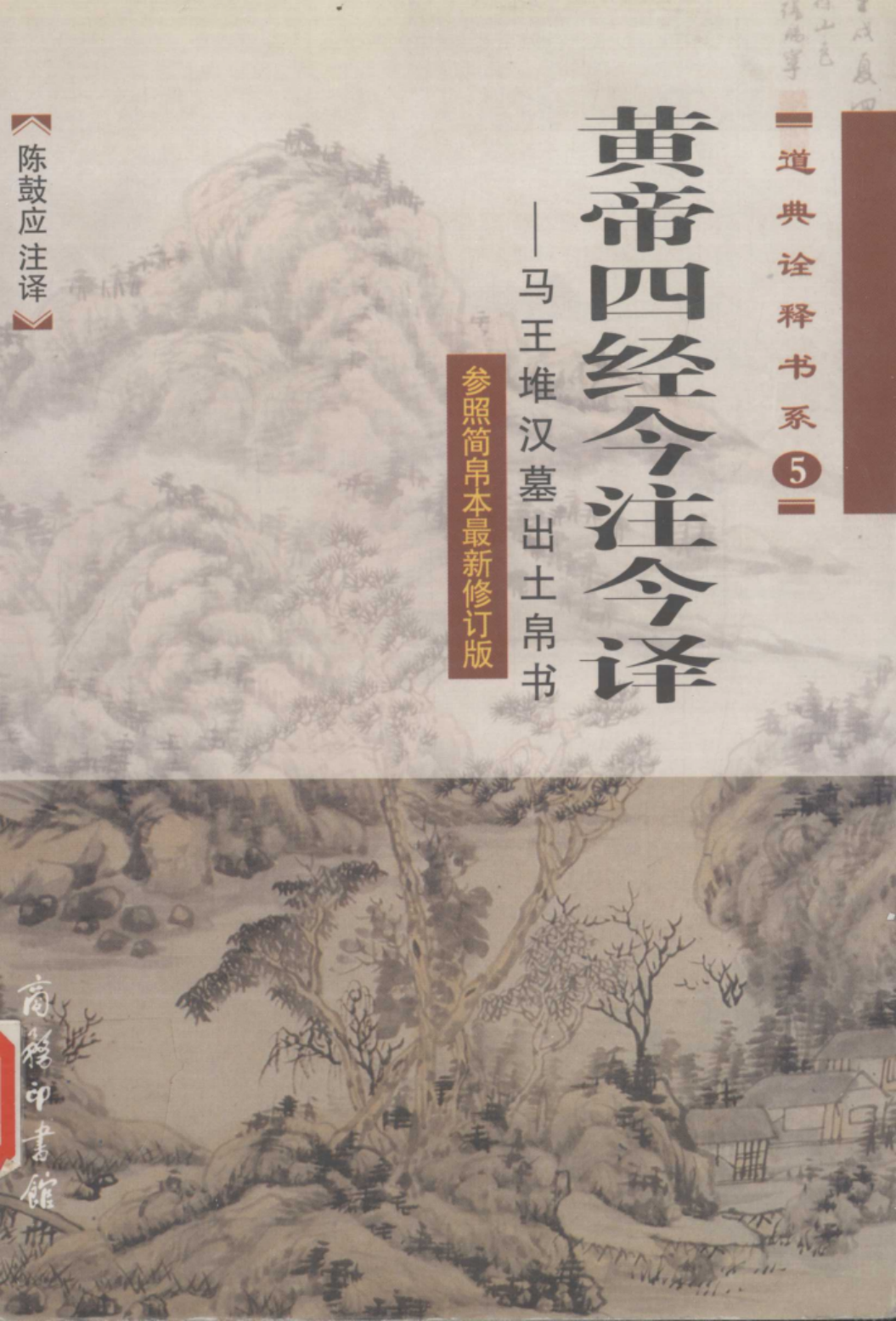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

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

陈鼓应注译

商务印书馆



道
典
诠
释
书
系

5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ISBN 7-100-05007-3



9 787100 050074 >

ISBN 7-100-05007-3/K·932

定价：28.00 元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

陈鼓应 注译

商务印书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陈鼓应注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道典诠释书系)
ISBN 7-100-05007-3

I. 黄… II. 陈… III. ①四经—注释②四经—译文
IV. R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350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
陈鼓应 注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5007-3/K·932

2007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北京商务印书馆重排版序

陈 鼓 应

帛书《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是研究先秦黄老道家的重要文献，我先后对这两书作了详尽的解释，现在由北京商务印书馆以简体字重排出版。

战国百家争鸣，黄老独盛；黄老学说，可说是显学中的显学。

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开创期，学界不少人由于对战国黄老缺乏基本的认识，因而对先秦各学派思想的交互流向显得含糊不清，例如保存在《管子》书中的材料，具有哲学内容的作品，多属黄老道家的遗著（其中以〈内业〉〈心术〉上、下与〈白心〉为代表）。又如《吕氏春秋》这一巨著中，黄老学说成为该书的主体思想。如果不了解黄老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向各地传播的情况，就不会注意到《庄子》外、杂篇吸收了不少黄老的思想；也不会留意到荀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直接来自黄老思想；当然更不会想到《易传》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以及《系辞》“天尊地卑，贵贱位矣”等等思想观念可能受到《黄帝四经》的影响。

先秦道家派别繁多，早先我留意老、杨、列、庄四子，马王堆帛书出土后，才由老、庄而用心研究黄老。春秋末的老子到战国中期崛起的黄老学派和庄子学派之所以统称道家，由于他们都以形上

之道为宇宙本体之最高范畴,并以道德统摄性命之学。道家各派间虽有很大的殊异特点,正如儒家中孟子不同于孔子而荀子又不同于孟子一样,但各派都有以“道”统摄众说的气概。

道家的开创者老子,首次视人的思想视野从现象界提升到“道”的领域,从而将道与物的关系纳入到整体性的理论建构中,老子在道论的哲学系统中,阐发自然、无为、虚静、有无等学说,凡此皆化为黄老与庄学等后继者共同倡导的哲学论题,一如孔、孟、荀共同发扬仁、礼、孝悌的人伦德行(儒、道在视角上最大的不同,不完全在政治议题上,而在于道家从事于哲学思考,儒家仅着眼于社会文化层面问题)。道家各派,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我们不可因其共性而无视于其殊性,更不可因其殊性而否定其共性。如庄子“游心”、“忘”境的哲学精神,不仅为老子思想中所未曾想像,而其《逍遥游》篇旨所展现的“以游无家”的精神境界和《齐物论》之表达的齐物思想,也为诸子百家所未曾触及。同理,黄老思想的殊性,也有别于老庄。

战国黄老在道家阵营中具有这些重要的特点:(1)引法入道:周代礼制社会到春秋末已呈礼崩乐坏之势,战国时代法制应时而兴,为治理政局所必需,黄老道家迎接时代思潮,乃在道论的前提下,援引礼、法以入道,《黄帝四经》开篇便揭示“道生法”的宗旨。(2)主时变:老子提示行动要掌握时机(“动善时”),黄老更加强主时变——掌握时代动脉,推动政治社会变革。(3)君臣各司其职: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意指不妄为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好。黄老转化而为君主“无为”而臣下“无不为”——君主掌握基本方针政策(“主道约”),不得越权干预下位者职务,各级官吏专职分工,各

尽其能。黄老这一政治主张，影响至为深远（魏晋时郭象注庄子，犹反复倡导黄老各司其职的观点）。此外黄老倡导以“虚无为本，因循为用”以及采各家之长、动用众智等，黄老是老学治道更加向现实世界落实的一派学说。

序

一九七三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古代帛书，尤其《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最为重要。据唐兰等学者考订，认为这便是见于著录而久已失传的《黄帝四经》。此帛书的发现，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先后出版过几种校释、整理的本子，这其中有一九七四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一九七六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经法》、一九八〇年文物出版社再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等，各本以后者为优。此外还有友人余明光教授著《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及其新作《黄帝四经今注今译》（湖南岳麓书社一九九三年版）。这些版本、著作，都是我主要的参考书。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开帛书《黄帝四经》研究的课程，一方面我注意到这书和《管子》、《文子》、《鶡冠子》等战国黄老之学著作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我也留心到它和《易传》的思想脉络发展的关联。《黄帝四经》是现存最早也最完整的黄老道家的作品，它的出土，使我们对于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取得思想界主导地位的黄老学派的发展线索，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与评估。可以说，由于它的问世，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也使得我们

2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对先秦各学派之间的流脉关系需要做一番重新的省察与探索。为此,我投下了不少的心力来阐释这一珍贵的出土文献。

本书在撰写当中,试图建构起一个较完整的注译体系。出于这样的思考,因此体例是这样拟定的:每篇下列解题,每小节下列内容提要,每小段由原文、注释、今译、阐述等四部分组成,书末附《帛书黄帝四经校定释文》。“阐述”部分有助于更具体、更明确地了解全书的文义和思想底蕴。本书主要依据一九八〇年帛书小组整理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本,书末所附即依据此帛书小组本为蓝本。

我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经常和北大哲学系副教授王博讨论书中的细节。在本书告竣即将付梓之时,我要特别感谢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毕业硕士研究生赵建伟副教授,书稿的全部核对工作是由他帮助完成的。还要感谢《道家文化研究》主编助理沈红宇女士,她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打字工作。商务印书馆(台湾)负责本书编辑工作的陈淑芬小姐,为之付出极大的心力,在此一并致谢。

陈鼓应

一九九五年春序于台北

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

——从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说起

晚近，由于考古文献的出土，丰富了古代思想史，也改写了古代哲学史。

出土的众多文献之中当属道家类古佚书最受瞩目，其他大批的医书、数术、方技、兵书也和道家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仅就明确的道家出土文献来说，如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和《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等四篇（通称《黄帝四经》）、《老子》甲本后古佚书《伊尹·九主》以及不久前刚公布的帛书《系辞传》。此外还有河北定县出土的《文子》残卷、湖北荆州出土的《庄子·盗跖》篇，再则一九四二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也和道家思想有所关联。总之，近一二十年来，逐渐公布的珍贵文献，给我们在道家的研究上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新领域。从而使我们重新认识到黄老道家在战国中后期之所以成为百家争鸣中主要思潮的概况。

在众多出土的文献之中，道家黄老之学这一系的古佚书的确最为丰盛。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出土的《文子》残卷，原件虽然至今尚未公布，但这一实物证据最低限可以证实它并非伪书，并可证实它的成书在《淮南子》之前。文子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文

4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子》一书是文子学派之作，以老子哲学为主体而融合了庄子思想和黄老之学的一部道家典籍。《鹞冠子》是战国后期楚国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此书长期受到冷落，近来由于马王堆《黄帝四经》的发现，参加帛书整理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它与《鹞冠子》的关系。英国著名学者葛瑞汉(A. C. Graham)发表了《一部被忽视的汉以前哲学著作〈鹞冠子〉》的论文，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公布之前，《鹞冠子》曾被视为伪书，近来李学勤教授撰文《鹞冠子与两种帛书》，推定鹞冠子活动年代在战国晚期前半，并论证《鹞冠子》成书在秦焚书之前，并非伪书^①。在各地出土的古文献之中，以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最受海内外的重视，至今已有多国的译本，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不过个人以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出土文献莫过于《黄帝四经》（即《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然而这书迄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大陆学者多推断它是战国末期的作品，为此我曾作过详细的考订，论证它的成书可能早于《孟》《庄》，当在战国中期之初或战国初期之晚（详见《〈黄帝四经〉成书年代的问题研究》），因此可以说它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黄老之学著作。《黄帝四经》全文约一万一千多字，第一篇《经法》主要是讲论自然和社会中所存在的恒定的法则。第二篇《十大经》主要讲形名、刑德、阴阳、雌雄等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关系。第三篇《称》主旨是通过对阴阳、雌雄节、动静、取予、屈伸、隐显、实华、强弱、卑高等矛盾对立转化关系的论述，为人们

^① 李学勤：《鹞冠子与两种帛书》，刊在陈鼓应主编，香港道教学院主办《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权衡选出最有效的治国修身的方案。第四篇《道原》就是对“道”的本体和功用进行探源。由于这部《四经》的出土，使我们对先秦道家发展的脉络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与评估，同时对于先秦学术流脉也提供了许多新的认识。兹分别申述如下：

一、帛书《黄帝四经》和《老子》的关系

(一)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给《老子》成书早期说提供了有力的新证。

《老子》的哲学思想散见于《四经》各篇。据我概略的估计，《黄帝四经》一书引用《老子》的词字、概念，多达一百七十余见。成书于战国早中期的《四经》以及成书于战国中期前后的《管子》书中，处处流溢着《老子》思想观念的影子，可证《老子》一书传布的久远，而司马迁《史记》所述老聃自著上、下篇当近于史实。

(二)由于帛书《老子》将“德经”置于“道经”之前，这使得学者们对于帛本与通行本顺序的不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帛书《四经》的篇目排列，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一疑案。

早先，高亨等学者便认为“从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来看，《老子》传本在战国期间，可能就已有两种：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这当是道家的传本。……另一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当是法家的传本”，并认为“《韩非子·解老》首先解《德经》第一章，解《道经》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后部，便是明证”^①。这

^① 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载《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种看法,在众多的观点中是较为可取的,而在我们对于帛书《四经》进行深入研究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道经”在“德经”前的《老子》通行本维持了《老子》的原貌,是老子道家的传本;而“德经”在“道经”前的帛书《老子》本,应该是黄老道家的传本。“道”的向社会性倾斜,是黄老学派对老子思想的一种发展,也是黄老道家的一大特点。《黄帝四经》《经法》在前、《道原》在后,恰与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相一致,这乃是黄老学派落向现实社会的表现。而以老子道家为宗的《淮南子》,则将《原道》列于书首,这恰与《老子》通行本“道”在“德”前的次序相吻合,《淮南子》之重视《原道》,似可作为祖本《老子》顺序的一个佐证。

(三)在《老子》与《四经》之间,仅从“道论”角度,便可看出老学到黄老之学的差异发展。

帛书《四经》继承了老子的道论,而向社会性倾斜。比如,无始、无名、无形、隐晦莫测等特征,构成了老子的“道”的本体论。而《四经》则从相对立的角度,从既不可感知又可以感知的二律背反的角度来阐释“道”,认为它既有原又无端、既隐微又显明、既运动变化又静止恒定、既高深不可企及又浅近可以企及、既虚无又实有……。《四经》这种重新整合的“道”的本体论,就为人们“道”的“握”和“操”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的依据,也为人们有效地掌握“道”的本体以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功用提供了前提。老子道家与黄老道家在“道”的本体论方面的差异,就构成了道家的两个不同走向:高深超诣与易简世俗,正与禅宗之北宗与南宗之分化相似。

“道”的具现,也即社会性,黄老道家对老子道家在此点上有着更突出的发展,并且多所修正。《四经》关于雌节的论述,对刚柔的

论述,对争与不争的论述等等,都对老子道家有所诤正,这是众所周知的。关于无为与无不为(有为)的论述,黄老道家与老子道家有着明显的分歧。老子的治国次序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术、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因此“道经”在前而“德经”在后。而《四经》的治国次序则是有为一无为。有为,包括法、术、势、形名等等。有为是手段,无为是目的。这种理国的次序,用《四经》的原话说便是“太上无刑,其次(正法),其下斗果讼果……太上争于(化),其次争于明,其下救患祸”。所以,《四经》是《经法》在前而《道原》在后。

二、帛书《黄帝四经》和范蠡的关系

帛书《黄帝四经》引用范蠡的言论达十七八条之多,从其中思想线索来看,便可见范蠡可能是由老学发展到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

我们从《老子》、《国语·越语下》和帛书《黄帝四经》三书,可以看出老子、范蠡到黄老思想的发展脉络。范蠡是春秋末期人物,比老子晚约三四十年,从《国语·越语下》可以明显地看到范蠡受到老子的直接影响,在“圣人因天”、“必顺天道”、“知天地之恒制”的论点,以及“赢缩转化”之道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等重要论题,都显示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学之先河。范蠡身处国家存亡危续之际,他的时代特点及其所处地位,使他将老子思想灵活运用到了军事上,他认识到说:“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这也是老子所

说的：“兵者，不祥之器”、“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遂”。范蠡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老子尝言：“大盈若冲”（四五章），戒人“果而勿骄”（三〇章），劝人“不自伐”、“不自矜”（二二章），并谓“自伐者无功”（二四章）。范蠡替越王勾践灭吴国，“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权倾一朝的范蠡则“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浮海出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在中国历史上，范蠡是第一位真正体现老子“功成身退”哲理的人。

范蠡是楚人，他的入齐，在楚越文化与齐文化的交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由现存《管子》和帛书《黄帝四经》抄录不少范蠡的言论可以为证。此外，老子思想的入齐，范蠡有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老学的传播者。并且，由于春秋末的范蠡之巧熟运用老子的哲理，这也给予《老子》成书早期说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新证。

三、《黄帝四经》和《管子》的关系

《管子》是一部“稷下丛书”^①。这部书汇集了战国中后期在齐国首都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时各家各派的论文，但“中心是黄老之学的论文。这部书还是稷下学术中心的情况的反映。”^②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管子》四篇（〈内业〉、〈白心〉及〈心术〉上、下）被视为稷下道家的代表作而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的精气说，为稷下道家首次提出，为《易传》和后代哲学及医学广泛接受。

①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六辑。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黄帝四经》的问世,由于它和《管子》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两书的内在联系首先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同时也使得《管子》书中保存的黄老学说的文献,越发受到关注。

根据唐兰先生所列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引文对照表”,可以看到《黄帝四经》和《管子》两书相同或相近的段落文句有二十三处之多(举例如:(1)〈道法〉:“道生法”,《管子·心术》引作:“法出乎权,权出乎道”。(2)〈道法〉:“虚无(刑)形”,《管子·心术》引作:“虚无刑谓之道”。(3)〈道法〉:“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管子·内业》引作:“道也者,……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4)〈道法〉:“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四度〉:“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管子·正》引作:“废私立公能举人乎。”(5)〈观〉:“春夏为德,秋冬为刑。”《管子·四时》引作:“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等等)。经过我们仔细考查,认为当是《管子》沿袭《黄帝四经》。《管子》书袭取《四经》的,计有〈内业〉、〈心术〉、〈白心〉、〈枢言〉、〈九守〉、〈四时〉、〈五行〉、〈势〉、〈正〉及〈重令〉、〈幼官〉等篇。除〈重令〉、〈幼官〉之外,其余九篇都是属于稷下道家的作品。黄老思想之盛行于稷下道家,于此可见。

在帛书《四经》发表之前,虽然司马迁曾一再提到稷下道家人物,如环渊、田骈、慎到、接子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还说“申子学本于黄老”。然而学界普遍以为这说法可能是出于司马谈崇尚黄老而以己意立说,直至帛书《四经》公布,才证实“黄老”并不只是个名词,而是实际兴盛于战国中期的学说思潮。

“黄老”是黄帝、老子的合称,它以老子哲学为基础,而寓托于

黄帝以进行现实政治的改革。这股政治哲学的思潮兴起于战国中期，它之渊源于齐或楚越固有争议^①，但它昌盛于齐，为稷下道家所倡导并在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中取得主导地位，当无疑义。黄老思想经稷下道家的发扬而流传于全国各地，儒家的孟、荀和法家的申、韩，都受到黄老道家的重大影响。

黄老学说为稷下道家所倡言，它的中心思想为“道法”。帛书《四经》开首便标示：“道生法”，《管子·心术》亦说：“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派学说以老子道论为其哲学理论而融入齐法家的形名法度思想。稷下道家流派繁多，可能有的讲老学，有的讲易学，不必然全都是主张黄老“道法”思想。而主张黄老之学的，也可能有不同的倾向，有的偏重于治身，有的偏重于治国，前者如《内业篇》的作者，着意于修心静意、养精理气，这一系可能直接继承杨朱贵生思想（也发挥老子“专气致柔”的摄生观念），后者则致力于现实体制的改革，为纠正传统文化中人治之弊（儒家之推崇人治为其代表），故而提出“道法”思想——这一系成为整个战国中后期的主流思潮。

稷下道家的人物，除彭蒙之外多有著作传至汉代，《史记》称环渊著上、下篇，《汉书·艺文志》则载《蜎子》十三篇，今佚。田骈，《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田子》二十五篇，已佚。慎到，《史记》称他“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明时仅存五篇，现《慎子》七篇，为钱熙祚校本。接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

^① 学者多主张黄老思想渊源于齐，晚近青年学者王博独特异议，请参看王文《论〈黄帝四经〉产生的地域》，《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